

古巴英雄格瓦拉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名字受到多少人的景仰,受到多少人的崇拜。我在青年时期曾经当过他的翻译，与他有一段不平常的交往,感到非常荣幸。

那是 1960 年的冬天。11 月 17 日格瓦拉率领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到北京。当时外交部调集了许多单位的翻译人员组成接待组,我也是其中一员。我去机场欢迎他还与他握了手。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格瓦拉时的主要翻译是蔡同卿和陈用仪。我参加了一些座谈和参观访问的陪同翻译工作。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11 月 20 日陪同他参观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

这次参观是在李先念副总理与格瓦拉举行了工作会谈并签署了两国政府的经济合作协定之后安排的。根据两国经济合作协定,1961 年至 1965 年间我国向古巴贷款 6000 万美元,援建一些工业项目,并在 1961 年度购买古巴 100 万吨蔗糖及镍、铜各 5000 吨。格瓦拉对中国政府慷慨无私的援助非常感谢,赞不绝口。那天参观的心情也特别高兴。他对这次参观特别重视,对各种工业机械产品,特别是农业机械非常感兴趣。认为不少机械正是古巴目前所需要的,要在中国购买的。参观时他对产品的规格,用途和价格询问得十分详细,并作了记录。并与操作和现场表演的工人亲切交谈。

我们参观了整整一上午,在展览馆门前与陪同人员一起合影留念。格瓦拉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平易近人,朴实大方,和蔼亲切,讲话时总面带笑容,使人感到很温暖、很体贴。与他沟通很容易,很轻松。

我当年 26 岁,小他 6 岁,他把我当作小弟弟一样看待,和我随意

1960 年切·格瓦拉访问中国

◆ 王怀祖

【作者简介】

王怀祖 1956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曾任该校图书馆馆长。西语教授,翻译家。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特邀西语翻译,参加过《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西文翻译定稿工作。1989 年后移居西班牙,2003 年回国。主要编译著有:《全球汉诗三百家》(合编),《西班牙语句法概要》,格瓦拉的《论游击战》,《卡斯特罗言论集》(合译),《宋代诗词三百首》。

交谈,无拘无束,十分自然。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可爱可敬的大哥哥,而不是一位古巴革命的领袖和英雄。他对我说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喜欢读毛主席的著作,崇拜他的游击战术,他自己也写了一本《游击战》,是他学习毛泽东游击战的心得体会,所以他是毛泽东的学生(正因为如此,我后来将他的《游击战》翻译成中文出版)。他还对我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接见使他很激动,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他回古巴后一定会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全力支持传达给古巴人民。说实在的,在我的翻译工作中,像格瓦拉这样对一个翻译像小弟弟一样随意交谈,毫无顾忌地畅谈自己想法的国家领导人没有第二位。因此我对此非常感动。

然而当时我对格瓦拉的历史还不太了解,所以我对这次翻译经历

没有充分重视,我们俩有一张单独的照片,原来存在相片夹中,后来才觉得它太珍贵了,就拿了出来,放到其他地方,结果现在反而找不到了。

几年后听到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战死的消息很震惊和难过。开始翻阅一些他的资料,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他 1928 年 6 月 14 日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他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是西班牙的后裔,他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则是爱尔兰的后裔。切·格瓦拉是这个西班牙和爱尔兰裔贵族家庭的长子。早年学医,曾利用假期周游拉丁美洲。1951 年,休学一年环游整个南美洲。在这次游历中他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1955 年他在墨西哥结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兄弟,参加了他们的革命组织,并很快成为卡斯特罗最得力 and 信赖的助手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在两年的战斗中他既是指挥官,又是医生,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游击战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古巴革命胜利后,出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部长。后来却辞去职务,离开古巴到第三世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他离开古巴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

他临行前在给卡斯特罗写的告别信中说,他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的革命者在

豪华的生活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选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槃式的壮美结局。我想,不管什么原因,他的出走最重要的还是他要解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穷苦人民的理想主义促成的。他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付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既是一种悲剧,又是一种令人尊敬的人格升华。

格瓦拉于 1967 年在玻利维亚被捕,继而被杀。自他死后,他的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世界左翼运动的象征。在世界上刮起的青年人赞美、崇拜格瓦拉的热潮中,格瓦拉成了传奇人物,有些民族甚至把他神化了。他的形象愈来愈高大,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愈来愈广泛。

最近我们一行四人到古巴去参观游览,本想拜会我曾经给他做过翻译的古巴前教育部长阿尔曼多·哈特,可惜他生病住院了,没有见到。只是与他的秘书 CHELA 和他的副手 HECTOR HERNANDEZ 见了面,并且谈到了古巴革命先驱何塞·马蒂的思想以及将于 2016 年 1 月在哈瓦那召开的纪念马蒂的《“团结大众为所有人的幸福”第二次国际会议》。

阿尔曼多·哈特是古巴马蒂研究中心的总负责人。他的办公室就是研究和宣传马蒂思想的。阿尔曼多·哈特也是格瓦拉的亲密战友,他为格瓦拉的一本图片集写了一个序言,对格瓦拉有极高的评价。

这本图片集收集了格瓦拉古巴各个关键时刻的照片,包括战斗,训练,射击,与战友们在一起,与妻子儿女在一起,在胜利后的群众大会上,在联合国的大会上,访问中国和非洲与各国领导人的会见,在建设工地的劳动现场上,骑马,喝酒,抽雪茄,下棋,打棒球的照片,非常齐全,反映了格瓦拉短暂的但十分充实、精彩绚烂的一生。

这些照片充分表现了格瓦拉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革命领袖,英勇的游击战士,医生,而且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一向衣着简朴,没有任何做官的架子,能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在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因此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是全世界劳苦大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偶像和崇拜对象。

阿尔曼多·哈特在文章中写道:“(格瓦拉)把他理论上的天才与他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他的成就在于,他锻炼和自觉地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和品质,以达到他认为的人类道德的最高阶段:革命者。他创造性地从我们美洲的精神文化,即玻利瓦尔和马蒂的文化中吸取了道德意识。认为在进行道德教育中,学校,文化,教育、政治和社会机构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又强调主观因素的特点,每个人都是自己最重要的决定性的教育者。”

“格瓦拉少校是 20 世纪最优秀的精神传统的标志,他的光辉将影响下一个世纪,影响 21 世纪的每一个人。他认为马蒂的思想:‘人具有聪明才智的一面,又具有仁慈和爱的一面’是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统一在人的身上的。格瓦拉的一生典范地体现了这一点。”

从郑和故居到三不老胡同一号

◆ 徐城北

【作者简介】

徐城北 学者、作家、演说家,关注领域:京剧、民俗、电视文化及京城文化。出版作品 70 余部,追求好玩,好看之外,再加一点文化思索。代表作有《京剧与中国文化》、《老北京》三部曲、《梅兰芳》三部曲、《字号文化》三部曲。

关的干部,住了部分落实政策的统战人士,我家隔壁住着民革的一位老人,衰老得很,行走不便,但腰板笔直,仍有军人的余韵。夫人看来比他小十几岁,很洁净秀美,一个儿子,硕长白净斯文,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回来后奉职报社。据说老人曾做过张少帅的副官。四楼住着蔡锷将军的儿子蔡端先生一家,夫妇俩有四个女儿,还有第三代,三代人都很严谨规矩,教养极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个大院的成员结构使得三不老一号院在三宝太监的名号下又增加了一痕光辉,神秘。

而后来这个院落的更加有名,归于北岛的文章《三不老胡同一号》。他在 1957 年就搬进来了,赶上了大院的鼎盛和衰落,我年长于他,却比他晚住进来二十五年有余。他文章中的假山、防空洞的位置应该已经被我们这栋新楼替代了。

我从“文革”开始的游历漂泊无所归依十几年,八十年代初返回北京,工作安排在中国京剧院当编剧,但京剧院没有宿舍,我的小家一直和父母一起住在西四北六条的私房中,那是母亲在解放初期用 5000 元稿费购得的小院。从没住过公家的房子的父母,当时的编制在全国政

协,“文革”后,“改正”后,他们的级别都不算低,几次有机会分到比较好的单元楼房,他们说不愿意离开接地气的平房去住“鸽子笼”而放弃了。这次三不老两居室因为离六条近就接受了,便让我们过去住。于是,我幸运地比较早就好好地过着当时北京普通居民中相对安稳的日子。父母离不开我女儿,朝八晚五,爱人从东皇城根边的民盟中央机关每天下班回西四北六条的父母家,我白天不知云游到哪里,或从京剧院过来,一家三代人聚齐,算是对十多年被迫的离散进行补偿。家里请了一位河北香河的“陈奶奶”帮忙料理。陈奶奶小脚,大字不识,属于旧时代的“义仆”,绝对忠厚贴心,过日子比主家还俭省,尤其疼孩子,比我们有过之。夏天常用自己的钱私下给孩子买冰棍,冬天她和孩子住的小西屋里的炉台上,总是烤着馒头片,这是孩子从幼儿园回来的一等美食。有段时间我和袁世海先生合作出书,联系得很密切,他常在晚饭前后打电话过来,每次陈奶奶接了电话都会站在北屋门口冲着西屋大喊“徐城北,袁世凯来电话了——”我们都笑,袁先生在电话那端也笑,纠正她几次都没有用。不识字的老人家脑子里一直记得民国的事儿。

每天晚饭后我再骑车溜着西皇城根的边穿胡同把爱人带回到三不老,无冬历夏,日复一日,于是,我骑车带人的技术大有长进。

再说回三不老胡同这个地方,它东起德胜门内大街,与弘善胡同相接;西至棉花胡同,与航空胡同相接;南侧与花枝胡同相通。既是胡同

又离大街不远。不论去什么地方,来去都很方便。一辆旧自行车就基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看望前辈,或者到图书馆查资料,去东四八条全国剧协开会,甚至是为了某件重要的事情,骑车到劲松去找张云溪、到三里屯袁世海家、西单太平街翁偶虹老先生家,北新桥的范钧宏先生家,西直门京剧院宿舍的张伍家,魏公村大院耿起昌、李维康家,刘长瑜家,还有李济济家等等,这对我都不是问题。

对于我来说,“三不老”是福地,不光因为曾是传说中的“三宝太监”府邸,这只是一宝,它还有两宝:一宝是地理位置,三不老胡同属什刹海街道,是首都北城中独一无二的一片绿水。表面上它地域有限,街道也不甚规整。但城区里名贵的水域,那时受益的不是观光客而是本城居民,尤其是我们住在近边的,都不用骑车,抬腿就去遛个弯,看看钓鱼的,游泳的,溜冰的,卖时鲜蔬果的,卖真假古玩的。水边打套太极拳,回家头脑清晰,笔下生风。另一宝是人文,“焦大故居”里的黄宗江阮若珊老师,胡同深处的沙博理风子夫妇,临水而居的巫巫三夫妇,都是我经常聆教的长辈老师。尤其是同住着的冯亦代伯伯和郑安娜阿姨,我每次去看他们勤奋的工作情景,都会心生愧疚。他们都是黎明即起,冯伯伯病后稍一恢复仍是这样。狭窄的书房临东窗的书桌边,亦代先生写作,安娜阿姨系着围裙戴着套袖洒扫忙碌,然后两个人安静地工作。北岛文章中写的“冯妈妈”在炉灶和书桌两边忙碌,我也亲眼见过,他写的冯亦代先生在用毛巾擦背,很写实,那时

的楼房并没有专门的淋浴设备。三不老胡同一号院的“听风楼”名声在外,译文佳作一篇篇,一本本,而它只不过是一个面积六十平米东北向的没有厅的两居室,冬天西北风一刮,屋里金戈铁马风萧萧。

宗江老师有时也来我家,笑眯眯地吃碗我爱人做的担担面,一碗意犹未尽,用筷子戳着辣椒油往嘴里抿,赞不住口“真好吃!”爱人是下班回来匆匆忙忙,来不及做什么,印象中除了面条只有一两样小凉菜。放下碗我们便骑车去人民剧场或民族文化宫看戏。戏从不自看,我是边看边用纸笔记,他是过心过脑的琢磨,过几天的座谈会上宗江老师幽默诙谐又极认真地侃谈,我则一篇小文见报。看戏的方便,对我来说,是三不老的又一宝吧!

在三不老一号院,是我一辈子过得最扎实的岁月,在这十几年当中,我写了京剧《武则天》等京剧本,写成《梅兰芳与二十世纪》等几十本书。在这里我度过了中年。院子里的同龄人还多,彼此都霜雪满头了,有的相见不相识。老街坊旧邻居还有认识的,执手唏嘘。更多的是陌生的面孔。每次我一定会到一号楼前站一站,是对冯伯伯安娜阿姨的哀思怀想,也是对那一段生活的怀念。只是院子规整了,旧的痕迹基本上找不到了。但幸亏“三不老胡同一号”的名字还在,这是 600 多年前的伟大的航海家留在人间的重要痕迹。也是多少在这里住过的人心里永远抹不去的印记。

